台灣文學研究
第三期 2012年12月
Taiwan Literature Studies
No. 3, December 2012.
頁碼：175~218

女人作為一種隱喻： 黨外雜誌中政治性別化的民主隱喻

Women as Metaphors:

Women as Metaphors for Democracy in Dang-Wai Political Discourse

李淑君
Li, Shu-chun

收稿日期：2012年3月18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2年11月13日

Received: Mar. 18, 2012; Accepted: Nov. 13, 2012

李淑君，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e-mail: shuchun0831@gmail.com

摘要

本文以1975年到1986年的黨外雜誌為觀察對象，論述參與黨外運動的女性如何被再現及其意義。本文認為黨外雜誌中所呈現的黨外女性以兩大類型反覆論述：即陽剛／陰柔、反性別常規／符合性別常規、戰士型／受難型的兩種面向呈現。陽剛／反女性傳統形象的論述以呂秀蓮、陳菊、陳婉真與蘇慶黎「四大女寇」為主。「四大女寇」原本是國民黨對黨外運動四位女性的污名，但黨外雜誌以及黨外人士挪用了「四大女寇」來稱呼呂秀蓮、陳菊、陳婉真與蘇慶黎四人，並視為一種反叛國民黨的黨外力量，其呈現陽剛性與反對力量以象徵與彰顯民主運動的對勢力。相對的，「代夫出征」論述則符合社會規範下強調女性必須陰柔、純潔、堅忍的特質，以「悲苦的」、「受難的」、「代夫出征」的女性來象徵民主的苦難之路。陰柔特質與民主苦難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隱喻。而「代夫出征」論述轉化到「鐵娘子」與「旋風現象」則暗示了黨外力量的再生。以上論述的幾種模式，包括具備奉獻犧牲精神、強悍俠義形象的「四大女寇」、民主苦難象徵的「代夫出征」女性、單影隻的「受刑人太太」、強硬的「鐵娘子」形象、重新站起來的「某太太」與「旋風現象」，在這些論述當中，可以看見凡是出現陽剛特質的隱喻，都指向民主力量的出現與復興；而當出現柔性、淚水與悲情等

待，都是指向台灣民主運動的受挫。黨外女性被放置在民主隱喻論述的位置，或者可以進一步說，黨外女性論述所隱喻的是民主歷程的發展。黨外女性出現戰士型與受難型；陽剛與陰柔特質的兩種對照，這兩種對照所進行的是一種民主反叛、受挫與再生的表述，而這兩種論述都是對台灣民主力量的隱喻。

關鍵詞：黨外雜誌、民主、性別象徵、代夫出征、政治論述

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Dang-Wai magazines (1975-1986) and discusses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as metaphors of democracy in Dang-Wai political discours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Dang-Wai wome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is masculine “women-warrior”, and the other is feminine “female-victim”. The “women-warrior” category is a metaphor for resistance against the KMT, while the “female-victim” is a metaphor for the trauma of democracy. When a “female-victim” became powerful against the KMT, they would be represented as more masculine. The masculine and feminine have a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and signify different meanings of democracy in different positions. In short, this essay analyzes how the women in these magazines served as metaphors for democracy.

Keywords: Dang-Wai magazine, democracy, gender symbolism, wife-on-behalf-of-husband in campaign, political discourses

正文

一、前言

在黨禁與報禁的戒嚴時期，黨外雜誌是民主運動過程中最重要的媒介。在台灣民主運動的呈現中，政論雜誌在政治參與運動占了很重要的份量。¹ 陳翠蓮在〈黨外書籍與台灣民主運動（1973-1991）〉一文提到戰後台灣的政治史是一部追求民主的運動史，而「政治運動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言論，一是行動。前者透過報紙雜誌書籍的發行，後者則展現在組黨的作為上。」² 黨外雜誌是承載民主論述的主要場域，黨外民主論述首要目標是以國民黨威權為批判的中心。在1975年到1986年黨外雜誌裡，政治女性的再現論述以兩大類別反覆出現：即陽剛／陰柔、反性別常規／符合性別常規的兩種面向呈現。

本文認為黨外論述將黨外女性視為對立於國民黨威權體制的行動者，其再現所要詮釋與指涉的是台灣民主的發展與歷史。當黨外女性具備女性／反對者雙重身分時，黨外論述將反對運動陣營的女性放置在民主運動者的位置。黨外雜誌中的民主論述，「反國民黨威權」是

-
1. 林清芬，〈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台灣黨外政論雜誌查禁之探究〉，《國史館學術集刊》5期（2005.03），頁259。
 2. 陳翠蓮，〈黨外書籍與台灣民主運動（1973-1991）〉，《台灣文獻》55卷1期（2004.03），頁3。

唯一優位性民主議題，在以「反國民黨威權」的自由民主為主導論述的黨外雜誌中，黨外女性的主體其實隱喻民主力量的再生。在黨外雜誌中，可以看見黨外女性被放置在民主論述中，民主身分大於性別身分，「女性描述」其實是一種「民主闡述」。這些對黨外女性的論述出現幾種模式，陽剛／反女性傳統形象的論述以呂秀蓮、陳菊、陳婉真與蘇慶黎「四大女寇」為主，視為一種反叛國民黨的黨外力量，以呈現陽剛性與反對力量的象徵來彰顯民主運動的反對勢力。相對的，「代夫出征」論述則符合社會規範下強調女性特質必須陰柔、純潔、堅忍，以「悲苦的」、「受難的」、「代夫出征」的女性來象徵民主的苦難之路。陰柔特質與民主苦難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隱喻。從「代夫出征」轉化到「鐵娘子」與「旋風現象」，則暗示了黨外力量的再生。不論是具備奉獻犧牲精神、強悍俠義形象的「四大女寇」、或是民主苦難象徵的「代夫出征」女性、形單影隻的「受刑人太太」、強硬的「鐵娘子」、重新站起來的「某太太」與「旋風現象」，在這些論述當中，可以看見凡是出現陽剛特質的隱喻，都指向民主力量的出現與復興；而當出現柔性、淚水與悲情等待，都是指向台灣民主運動的受挫。黨外女性被放置在民主論述的位置，或者可以進一步說，黨外女性論述所隱喻的是民主歷程的發展。黨外女性出現戰士型與受難型；陽剛與陰柔特質的兩種對照，這兩種對照所進行的是一種民主反叛、受挫與再生的表述，而這兩種論述都是對台灣民主力量的隱喻。

二、民主作為一種現代化：反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

從1968年1月出刊的《大學》雜誌便提出政治社會各層面「革新保台」，³「革新」之意便是希望七〇年代的台灣能以美國「現代化理論」來推動政治社會改革的理念。⁴在當時的時局之下，提到「民主」的意涵時，指的是一種西方自由主義式民主的概念，目的在引介自由主義的思想，追求言論自由、政治民主、大學體制與學術自由的權利等問題，⁵強調言說的自由，破除威權式的家長制度與國家體制。1975年之後的《台灣政論》、《八十年代》、《美麗島》三種黨外雜誌中，《台灣政論》代表性的議題是批評時政、提出建言，主要關懷在民主、法治、保障自由與人權等議題。批判國民黨一黨獨大是違背民主浪潮，因此民主現代化必須提倡民主與法治。鄭鴻生提到1975年《台灣政論》的出現，是以美國的「現代化理論」與新興政治勢力結合的象徵。⁶1979年6月創刊的《八十年代》，⁷主要議題在改革國民黨體制與要求政府民主化。《美麗島》關注較多的是選舉民主，皆展現對自由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追求，以及對國民黨老法統的撤離，可見當時現代性的訴求便是對威權傳統的撤離。政治現代性追求公共領域的「世俗性」展開，不再相信有神聖的、特殊的根源，而是對於自我的瞭解以及共同行動的正當性論據。⁸台灣民主運動「世

3. 蔡盛琦，〈《深耕雜誌》之研究（1981.6-1983.2）〉，《國史館學術集刊》15期（2008.03）頁165。《大學》創刊號（1968.01）。

4. 鄭鴻生，〈台灣文藝復興年代：七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狀況〉，《思想4：台灣的七十年代》（2007.01），頁81-102。

5. 如陳少廷〈論現代大學的社會責任〉一文，《大學雜誌》4期（1968.04），頁4-5。

6. 同註4，頁98。

7. 1979年6月創刊。以康寧祥為社長，江春男為總編輯。

8. 蔡英文，〈公共領域與民主共識的可能性〉，收錄於黃俊傑、江宜樺編，《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05），頁229-230。

俗性」的追求即是對國民黨威權神話的破除。

在美麗島事件之前的黨外運動，產生政治民主論述的方式主要就是「選舉」與「辦雜誌」兩種。⁹ 因此1970年代黨外雜誌是承載黨外民主論述最主要的媒介，《台灣政論》、《美麗島》《八十年代》，皆是黨外雜誌很重要刊物。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黨外雜誌更是紛紛出現。其中如《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這一系列（俗稱八十年代系列），便是事件前後在黨外圈內的重要雜誌。1981年周清玉創辦的《關懷》雜誌；1983許榮淑年辦《深耕》、《生根》、1984年《台灣年代》創刊；同時期亦有蘇秋鎮辦《代議士》；黃天福辦《鐘鼓樓》、《蓬萊島》；林正杰辦《前進》；尤清辦《博觀》；黃煌雄辦《開創》，未參與選舉的黨外青年如鄧維楨、鄧維賢兄弟主編的《政治家》、《民主人》；鄭南榕所主辦的「自由時代」系列週刊（包括《自由時代》、《先鋒時代》、《民主時代》、《開拓》、《發展》、《發揚》、《民主天地》等等；邱義仁、吳乃仁、劉守成等新生代創辦《新潮流》，可見黨外雜誌的蓬勃發展。¹⁰ 黨外運動的目的，是要推行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制衡，¹¹ 本文觀察這些雜誌提出的民主議題，從中可以看到從七〇年代的現代化訴求是政治民主。民主作為一種現代化，所要除魅的對象，便是國民黨威權體制傳統與魅影。誠如吳鴻森所言：「黨外之所以蓬勃興起，憑藉的是對國民黨強而有力的批判。」¹² 1978年12月11日桃園中壢「增額國大代表選舉私辦政見會」中，呂秀蓮提到「民主是現代政治的基礎，政府的產生是為著人民的共同需要。」¹³ 可見民主議題主要訴求突破國民黨

一黨獨大，這也是黨外雜誌與黨外運動最重要的政治現代化訴求，也就是必須對國民黨威權體制進行改革，社會才能邁入民主化的進程。

黨外運動時期的民主現代化進程幾乎是以美國「現代化理論」來推動政治社會改革。鄭鴻生談到台灣民主化的特質時說，「在七十年代之初，大陸與美國的開始和解預示著改弦更張，而台灣在陷入國際孤立，不再能代表中國之際，美國現代化理論成了當道之學。這真是一個全新的局面，以『現代化』為訴求的思潮，在那時取代了早期雷震、殷海光等人對自由與民主的素樸訴求。」¹⁴ 綜上所述，黨外運動的「民主」意涵，都是著重在自由選舉、民主憲政等議題上，現代性作為一種進步、理性、具備創造力的象徵，「黨外」相較於國民黨則是進步、民主、理性的，呂秀蓮提到黨外民主運動時說：「『黨外』一詞，是指相對於國民黨，而從事民主化運動的人士而言，它在台灣的現代化史頁裡，有它獨特的異采。」¹⁵ 黨外論述將黨外運動視為現代化中重要的一頁，在黨外雜誌中可以看到追求民主、去除國民黨威權魅影與傳統便是台灣政治民主現代化的訴求。

-
9. 如《深耕》雜誌提到在美麗島時代之前的黨外運動，所使用的手段就是「選舉」與「辦雜誌」兩種。深耕雜誌社，〈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座談會〉，《深耕》18期（1982.09），頁5。
 10. 參考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8.05）。
 11. 顏尹謨，〈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座談會〉，《深耕》18期（1982.09），頁11。
 12. 吳鴻森，〈許信良輔娘鍾碧霞將代夫出征〉，《客家風雲》11期（1988.09），頁27。
 13. 呂秀蓮，〈暴風雨前的信息〉，《我愛台灣——呂秀蓮海內外演說選》（高雄縣：南冠出版社，1988.05），頁44。
 14. 同註4，頁99。
 15. 呂秀蓮，〈政治廚房中的黨外女性〉，原載於1986年元月號《八十年代》，後收錄於《兩性問題女性觀》（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頁185。

三、黨外雜誌的女性再現

1970年代中壢事件、橋頭事件發生，蘇慶黎、曾心儀、陳菊等人都參與「堅決反對政治迫害」與「立刻釋放余登發父子」的陣營中。¹⁶ 陳菊在更早的時候便擔任黨外元老郭雨新秘書，在1970年代初期扮演著黨外的老中青三代的接合劑。1977、1978年中，雷震先生、齊世英先生、郭雨新先生，以及新生代黨外的人士都是透過陳菊等人在聯繫。¹⁷ 1975年之後，大量黨外雜誌出現時，更不乏黨外女性的參與。如蘇慶黎於1976年7月1日接手《夏潮》雜誌。1978陳婉真創辦《潮流》，美麗島事件後參與台灣建國聯合陣線，並擔任《美麗島週報》執行總編輯。1979年，《美麗島》雜誌社成立，副社長黃天福和呂秀蓮，編輯委員會成員則有蘇慶黎、呂秀蓮、陳菊等。

在參選行動上，陳婉真與前台大教授陳鼓應組織聯合競選團隊，參選台北市立法委員，但選舉到了半途卻因美國和中國建交而中斷，陳婉真於1979年7月赴美。之後因為《潮流》被禁以及相關人士陳博文、楊裕榮被逮捕，陳婉真在同年8月於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紐約辦事處門口進行絕食抗議，要求政府釋放因涉及印發《潮流》而被逮捕的陳博文、楊裕榮，因而於海外流亡十年。¹⁸ 在同時期的島內民主運動中，呂秀蓮與張春男等黨外民意代表候選人在台中遊行，警方以三輛大型遊覽車載滿攜帶鎮暴裝備的員警陪同，並以消防車向聚集群眾噴水。¹⁹ 1979年11月，呂秀蓮、姚嘉文等人舉辦「美麗島之夜」，並為吳哲朗舉辦坐監惜別會。年底，美麗島事件發生，警備總部以「涉嫌叛亂」逮捕了呂秀蓮、陳菊、蘇慶黎。另外，在美麗島事件與1980年2月林宅血案之後，受刑人家屬「代夫出征」²⁰，周清玉、方素敏、許榮淑、高李麗珍等人出來參選並走上政治之路。其中周清玉與許榮

淑於1980年底以全國最高票當選國大與立委。稍後周清玉創辦《關懷》雜誌與「關懷中心」，投入政治受刑人及其家屬的關懷工作，²¹許榮淑創辦《深耕》雜誌，方素敏回國參選並將林宅改為義光教會。

上述為黨外女性參與台灣民主的行動，從中可以看到黨外女性參與民主的意義。女性參與反對運動一來以女性身分參政打破政治屬於陽剛、男性場域的迷思；二來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下，以黨外民主人士的身分挑戰了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女性參與反對運動具有挑戰民主威權與性別威權的雙重意義，其身分也占據性別民主與政治民主的雙重位置。然而當黨外雜誌以「民主」作為一種現代性是主要的核心議題時，黨外女性被再現論述的方式則產生了民主的象徵與隱喻，下文亦將對此進行討論。

（一）「四大女寇」：陽剛性與反對力量的象徵

在黨外雜誌的女性論述中，女性的形象被區分為陰柔特質／陽剛特質兩種類型。陰柔特質／陽剛特質象徵的是台灣民主力量的挫敗

-
16. 楊青矗，《美麗島進行曲：第一部 衝破戒嚴》（台北：敦理出版社，2009.07），頁40。
 17. 薛化元主編，李永熾監修，台灣史料編輯小組編輯，《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1979-1988）》（台北：國家政策出版，1991.07），頁18。
 18. 陳婉真，〈未竟的選戰〉，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策劃，《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台北：時報文化，1999），頁85。
 19. 陳菊，〈選舉假期結束〉，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策劃，《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頁51。
 20. 在美麗島事件之後，被冠以「代夫出征」名義或政治修辭參選者，包括周清玉、方素敏、許榮淑、翁金珠、高李麗珍等人。但是本文認為「代夫出征」不僅僅是一個歷史現象，之後也演變成一種政治修辭。跟政治犯有關的參政女性，都是被視為「代夫」或「代父」出征，如翁金珠、余陳月瑛都在媒體或出版品上如此被呈現。
 21. 歷任增額國大代表（1980-1992）、民進黨中常委、彰化縣縣長（1989）、第十屆省議員（1993）、第四屆不分區立委（1998）、彰化區立法委員（2002）、台北生命線協會會長、家扶中心副主委等職。周清玉口述，張炎憲等人訪問，許芳庭整理，〈周清玉女士訪談錄〉，張炎憲主編，《民主崛起：1980's台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1》（台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8.04），頁182。

與展現，性別特質成為一種文化隱喻，並運用修辭進行民主意義的論述。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後，「四大女寇」的論述呈現陽剛特質與反對力量的結合。如1982年的《新生代》將陳菊、陳婉真、呂秀蓮和蘇慶黎等四位黨外人士，羅列為「台灣四大女寇」，視為政治極強悍的形象。在國民黨的威權論述中將「四大女寇」視為「像男人」，給予較多陽剛特質的想像；而在黨外文獻與黨外運動的用語中，「四大女寇」所帶出來的論述是一種反叛性、強悍、反國民黨力量的隱喻，被視為是「積極投入黨外運動對抗國民黨威權體制」。²² 其政治隱喻是一種反抗國民黨威權、積極挑戰政治場域的女性形象。在此「四大女寇」是反國民黨體制「強悍」、因追求政治民主而成為「階下囚」、或海外流亡的「亡命之徒」等為民主犧牲的形象出現。

陳菊、陳婉真、呂秀蓮和蘇慶黎在以「反國民黨威權」為核心論述的黨外雜誌中，同時呈現為強悍的反對運動女性。其中呂秀蓮被再現為熱情的社會改革者，回國後投身反對事業，走上政治異議者的坎坷路，之後一步步走上為民主人權而犧牲的路。²³ 呂秀蓮從27歲起就開始極力提倡新女性主義，但是在黨外論述的場域認為「呂秀蓮這三個字最後會家喻戶曉，卻是在民國六十七年她競選國大代表以後。」²⁴ 可以看出在黨外民主論述中，黨外女性的「民主人士」的身分位置被強調。其形象是憂慮台灣前途，為台灣尋求答案，「台灣性」大於「女性」的政治人物。

台灣共產黨員蘇新的女兒蘇慶黎，幼年看到美軍在台灣進行性消費時，對於身處第三世界的台灣女性處境印象深刻。²⁵ 蘇慶黎被黨外雜誌的政治評論者歸為「黨外左派」²⁶、「黨外女強人」²⁷、「為

弱者說話的女強人」²⁸。「女強人」的政治論述常見於政治女性的再現中，過往父權文化將「女性」與「柔弱」進行勾聯與指涉，女性被放置在女性／柔弱／私領域當中；相對的，政治領域被視為強悍／陽剛／男性的領域，當女性步入政治領域展現陽剛性時，「女強人」一詞意味是從陰柔邊界跨越而闖入陽剛的領域，其陽剛性一方面吻合政治領域屬於陽剛特質的期待；另一方面也顯示女性／陰柔才是常態，「女性」與「強悍」兩者之間是不合常俗，「女強人」一詞的弔詭也因此產生。

陳婉真於1977年為許信良參選桃園縣長之需，編寫了《風雨之聲》一書，1978年與陳鼓應組織聯合競選團隊，與吳哲朗辦地下報《潮流》。1979年與數十位黨外人士到余登發的老家高雄縣橋頭鄉遊行抗議，同年7月赴美；「美麗島事件」後參與台灣建國聯合陣線，並擔任《美麗島週報》執行總編輯。於海外流亡十年，曾任國大代表。黨外雜誌在論述陳婉真時，強調陳婉真強烈訴求言論自由、反政治迫害的形象。軒轅平〈折筆傳奇——陳婉真的心路歷程〉提到：

陳婉真在近年的台省政壇有一個流傳頗廣的封號：「姑奶奶」。對於這個稱呼，陳婉真的感受是複雜的，她說：
「在傳統的觀念裡，這個形同『厲害』的代名詞，對女孩

22. 何榮幸，〈曾與呂秀蓮、陳菊、施淑青並稱「黨外四大女寇」 抗癌11載 蘇慶黎病逝北京〉，《中國時報》，2004.10.20，a13版。
23. 孔傑榮，〈呂秀蓮的心路歷程〉，《鐘鼓鐃》1卷7期（1983.07），頁29。
24. 《生根》週刊特別報導，〈呂秀蓮回來了！〉，《生根》復刊3期（1985.04），頁31。
25. 〈蘇慶黎：為弱者說話的女強人〉，《新生代》創刊號（1982.04），頁18。
26. 同註25，頁17。
27. 李蓮英，〈蘇慶黎赴美深造〉，《政治家》1卷（1984.07），頁39。
28. 同註25，頁16-19。

子而言，並非很好的恭維。不過，基於新聞記者的特殊職責，我寧願以擁有這個綽號為榮。」²⁹

可以看見，陳婉真在黨外雜誌中，以國民黨的「喉中鯁、眼中釘」、「姑奶奶」的強悍姿態、反政治迫害的形象被論述。「姑奶奶」／「厲害」不屬於傳統女性值得讚揚的特質，但是在台灣文化中，陽剛／陰柔特質有上／下位階的關係，因此當陳婉真被視為強悍的姑奶奶時，是從位階低的陰柔特質轉向位階高的陽剛特質，強悍凸顯了對抗國民黨威權的反叛性。

被稱為「永恆的黨工」、「走於老、中、青之間」的陳菊早期擔任郭雨新的秘書，在美麗島事件前後是老中青三代人串連起來的主要人物，被視為是一個「忠實的反對者」³⁰，在論述中強調她是一位在崎嶇不平的民主道上行走，放棄逛街、郊遊、約會、婚姻等一般女孩的生活，刻劃其為台灣民主犧牲奉獻的形象。《台灣年代》描述陳菊於1979年12月13日被捕的前一晚，「突然自顧自的往前踏去，我從斜後側看到她龐然的身影，抬著頭，迎著風，傲視一切似的唱起歌來。」「那時已經十點多了，雖然路橋下不斷有車子駛過來駛過去，但是四周相當安靜，頗有高處不勝寒之感。路橋旁邊台大校園的椰子樹搖啊搖的，陳菊蓬蓬的頭髮被吹得有點揚起。她的歌聲低低的，不像女孩子的歌聲，有點悲壯，好像戰士要出征似的，有點自我吟唱，不管別人聽得見聽不見。」「她當時的整個身影，給我一種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感覺。」「我想，只有她自己懂得歌聲低沈的聲音代表了什麼。」³¹ 陳菊在上述論述中，呈現的是一個身體力行、無所畏懼的「黨工」、悲壯的「出征戰士」；是一心為台灣民主犧牲「女孩子

應有的生活」的女性，而「女子應有的生活」是屬於家庭、屬於私人情感，但陳菊「不像女孩子」的悲壯形象，是因為台灣的政治高壓，為台灣民主犧牲了原有「應有的女孩子的生活」。

綜上所述，可以看見「四大女寇」相關論述所要強調的是為民主運動掀起波濤洶湧的女性。在「四大女寇」——呂秀蓮、陳菊、陳婉真、蘇慶黎的相關敘述中，出現「強悍得不可言喻」、「亡命之徒」、「女強人」、「厲害」、「姑奶奶」、「戰士出征」的形象，這些論述未將她們放置在性別框架上的突破，反是放置在挑戰政治不民主的位置，且認為其突破傳統的性別形象是在政治不民主下犧牲了「應有的女孩子的生活」，強調「四大女寇」的強悍性格所要對抗的是國民黨體制的威權。七〇、八〇年代的女性解放論述已強調女性作為獨立個體的重要性，但當時論述多將女性位置置放在國家的富強的大框架下，女性獨立性與各項權利才獲得較多肯定。「四大女寇」呈現強烈的反叛、強悍、戰士般的形象，所要強調的不是女性自主的身分，而是黨外反國民黨體制的力量。在追求民主現代化論述中，「女戰士」的新女性形象經常與家國論述結合，成為政治色彩濃厚，以及現代新女性形象與革命者形象結合的論述，³² 而台灣戰後黨外運動中的女戰士形象亦是對抗國民黨的民主與家國論述。

29. 軒轅平，〈折筆傳奇——陳婉真的心路歷程（上）〉，《美麗島》1卷2期（1979.09），頁42-45。

30. 林龍溪，〈黨外的「苦力」，新生代的「褓母」——為理想無私奉獻的陳菊〉，《第一線》19期（1986.05），頁36。

31. 邱小如整理，〈陳菊，我們感念你！〉，《台灣年代》8期（1985.06），頁45-46。

32. 在中國的國族運動中，「女戰士」形象亦是「一個為革命理想與事業而勇於奮鬥」，「以救國救民為己任，有崇高的理想和使命感，有高昂的革命熱情」，是中國現代化中新女性形象向革命者轉化的論述。鄭永福、呂美頤，〈關於近代中國「女國民」觀念的歷史考察〉，鄧小南、王政、游鑑明主編，《中國婦女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04），頁285。

在政治領域中，男性被視為上戰場捍衛國家的武裝公民（citizen-in-arms）與「戰士英雄」（warrior-hero）；女性被視為某人的太太、某人的媽媽、某人的女兒等給予照顧的關係性角色。³³ 公民作為戰士英雄是一種有力的象徵，而女戰士（warrior females）與「鐵娘子」（Iron Ladies）的典型則強調具有原本被歸屬於男性陽剛性的強壯、堅強、攻擊性格等特性。柯娜（R. W. Connell）認為陽剛特質（masculinity）與陰柔特質（femininity）是對立的且具有位階性。陰柔特質被與脆弱（weakness）進行聯結；陽剛特質則與強勢進行聯結，產生了上／下、主導／從屬的位階性質，而陽剛特質做為複數多樣的型態，也具有主導與從屬的陽剛特質的差別，也就是陽剛特質並非單一存在的。³⁴ 黨外論述中，四大女寇則是以「女戰士」、「階下囚」、「厲害的姑奶奶」的身分被論述，具有強壯、堅強、攻擊性格等陽剛特性，其文化象徵上形成反叛國民黨的民主力量，從中可以看出反叛威權的民主力量會與位階高的陽剛特質進行結合。

（二）從「代夫出征」到「鐵娘子」、「旋風」現象：民主創傷到民主重振的隱喻

「四大女寇」論述之外，相對應亦有「代夫出征」的黨外女性論述。在民主受挫之後，「代夫出征」現象與論述隨之而起，台灣的「代夫出征」論述亦成為對立於國民黨的民主化身，是正義的旋風、政治不民主下的受難者、台灣苦難的象徵。「代夫出征」從字面上就可以讀出是「代替丈夫出征」的接班者、替代者的角色，丈夫是參政主體，妻子是參政代替與接班者，「代夫出征」論述並非以女性政治

主體為重心的論述。

「代夫出征」論述生產的歷史脈絡為1979年美麗島事件及1980年2月28日林宅血案之後，受刑人家屬「代夫出征」。其中周清玉（姚嘉文之妻）、許榮淑（張俊宏之妻）、方素敏（林義雄之妻）、高李麗珍（高俊明之妻）等人走上政治之路。同時期東亞的民主歷程中，菲律賓發生艾奎諾事件，柯拉蓉站出來參選受到民眾的支持，並喊出「people's power」的口號。許榮淑提到菲律賓的政治轉變影響台灣的民主與女性政治參與，並利用菲律賓的局勢，台灣黨外要求組黨。³⁵ 1980年12月6日恢復中央民意代表補選增額立委及國代選舉，美麗島事件家屬周清玉、許榮淑、黃天福當選，其中周清玉與許榮淑更以全國最高票當選國大與立委。黨外人士於1981年9月籌組「黨外推薦團」，以黨外立委為主幹，輔以監委尤清、國代周清玉、林應專等人組成。在美麗島事件之後出來參選立委的許榮淑，則接下《深耕》雜誌。1982年9月28日周清玉發表〈美麗島受難人共同聲明〉。方素敏則回國參選並將林宅改為義光教會。1983年底的立委選舉，台北縣與宜蘭、基隆為同一選區，當時，黨外主要人士都身陷囹圄，黨外人士的太太們全都「代夫出征」，藉此擴大立法院內黨外的聲音。³⁶ 除了政治參選之外，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周清玉開始進行受刑人家屬的串

33. Nira Yuval-Davis, *Gender & N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1997), p.73.

34. Connell, R. W.,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5), pp.16-70。

35. 張炎憲等人訪談，許芳庭記錄整理，〈許榮淑女士訪談錄〉，《民主崛起：1980's 台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2》（台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8.04），頁92。

36. 陳品，《非常女人》（台北市：大村文化，1996），頁91。

連，³⁷ 高李麗珍也展開受刑人家屬的關懷行動。上述為「代夫出征」女性的政治行動與歷史背景。

在黨外雜誌論述層面上，「代夫出征」論述在不同的歷史時間點出現幾個層次的轉變。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出現的多為悲情的、「望你早歸」的受難者家屬與「太太」；接著在1980年之後的幾次選舉勝利，則出現「鐵娘子」與政壇「旋風」現象。「代夫出征」論述出現在美麗島事件後的受難家屬競選時；「鐵娘子」與「旋風」論述則是競選成功後，對於黨外民主力量重振的展現。這些受難者家屬「代夫出征」高票當選後，形成「周清玉旋風」、「方素敏旋風」，³⁸ 其論述呈現美麗島受刑人家屬從民主受挫到高票當選，打開受刑人家屬參政的風氣³⁹ 的歷史轉變。在此將針對論述的陰柔特質與民主意涵、論述的轉折與歷史意義進行闡述，討論陽剛／陰柔特質的上／下位階中，位階高的陽剛特質被視為民主力量的展現，位階低的陰柔特質則指向民主力量的受挫。

1、「代夫出征」中的陰柔與悲情：民主創傷的隱喻

(1) 望你早歸：陰柔特質與民主創傷

在民主運動的歷程中，「四大女寇」的陽剛特質被視為是反國民黨的力量；「代夫出征」論述則以陰柔特質來隱喻台灣黨外運動與台灣歷史的悲情。在台灣殖民歷史中，陰柔特質經常被用來描述被殖民、被入侵與歷史悲情，殖民化與受壓迫過程被陰性化地隱喻。「代夫出征」女性的論述成為民主的悲情與苦難的象徵，是另一種將陰柔特質與民主苦難進行結合的政治論述。

在美麗島事件後，周清玉、方素敏、許榮淑等「受難者家屬」以

「代夫出征」之姿參政。在「代夫出征」的論述中，直接參與政治行動而入獄的男性被視為「政治受難者」；而妻子、母親、女兒等「關係性角色」的女性則被視為「受難者家屬」，可看出此論述以性別關係角色的家屬身分定義其政治受難的位置。「代夫出征」一詞本身即有政治「接班者」、非參政主體、受難者「家屬」的意味。而受政治迫害女性如周清玉、許榮淑與方素敏在「代夫出征」前，被論述為平凡的弱女子，只希望能安穩地當平凡的家庭主婦與妻子，但因為政治不民主，而走向從政之路。在女性屬於私領域的意識型態下，女性放置在私領域才是正常的生活與民主的表現，走向政治之路是因為政治不民主下所付出的代價。

「代夫出征」女性論述中，政治女性是以「血與淚」的代價為民主運動付出犧牲。如周清玉的相關報導中，1980年競選增額國大、立委選舉時，一聽到「望你早歸」的錄音帶，就在演講台上泣不成聲。⁴⁰「受迫害政治家家屬」等待、悲情的苦難等同於「民主的苦難」。《九十年代》中描述台灣婦女在政治有一席之地，都是一群被迫害的「政治犯家屬」，「她們的地位，都是用血與淚爭取來

37. 周清玉提到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她設法支援時，一開始「也不認識這些家屬，就從報紙一個一個找，那時候開始有聯繫的就是許榮淑、方素敏和黃信介的太太（張月卿），我想黃信介的太太可能是比舊的系統，我這邊又是另外一個，不熟的就開始聯繫，互相尋求支持，一起努力。」「之後我就開始寫陳情書，三更半夜我就一個人拿陳情書到處請人簽名。」見〈周清玉女士訪談錄〉，張炎憲主編，《民主崛起：1980's台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1》，頁205。

38. 如公孫龍即談到周清玉在民國69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在台北市造成一股「周清玉旋風」。之後方素敏參選，也製造了一股「方素敏旋風」。見公孫龍，〈周清玉的痛苦——對政治沒有興趣竟成為「黨外樣版」〉，《雷聲》32期（1984.11），頁30。

39. 同註10，頁170。

40. 葉鴻英，〈忍著辛酸含著微笑——訪尚在服刑的美麗島事件受難者家屬〉，《前進週刊》22期（1984.08），頁30。

的。」⁴¹ 1980年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是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的第一場選舉，黨外候選人受難女性以家屬身分「低姿態的悲情訴求」爭取選票，與美麗島事件前強烈的批判氣氛截然不同，充分反映出當時政治氣氛的凝重。⁴² 許榮淑的形象則是「拖著疲憊身軀，帶著稚女，扶著步履維艱的父親，目送你們逐漸消失在鐵門外，……需走入風濤險浪的世界，一個平凡的弱女子，你沒有非凡的能力，卻需要挑非凡的重擔，願上帝賜給你足夠的堅強來承擔時代的苦難！」⁴³ 張俊宏給許榮淑的信中，敘述平凡的弱女子若在正常的民主體制之下，原本應該歸屬於安穩的私領域中，但因為政治不民主而必須參與政治並承擔時代的苦難。

政治受難女性在私領域為平凡女性與妻子，卻因為承擔民主苦難而必須堅強起來，「代夫出征」女性的悲情，便是來自於時代的苦難。另外，畢業於台大社會系的周清玉則被形容為披著寫有「姚嘉文的太太」的彩帶，出現在政見會台上，以如泣如訴的感性音色，敘說美麗島事件後的政治氣氛及受刑人家屬的際遇，⁴⁴ 周清玉被視為憂患、悲情的角色。⁴⁵ 「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在「美麗島事件」審判後的論述，是一名傷心、流淚、脆弱、難過、無助、不解，覺得自己是「弱女子」的受難者家屬。⁴⁶ 陳若曦〈再出發的黨外〉一文，談到周清玉「一提及姚嘉文眼眶就紅，喉嚨馬上哽咽……，似乎姚嘉文不回來，地球會停止轉動一般。」⁴⁷ 葉鴻英提到1984年見到周清玉本人時，彷彿又看到「民國六十九年增額國大、立委選舉時，一聽到「望你早歸」的錄音帶，就在演講台上泣不成聲的「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⁴⁸

另一位「代夫出征」女性方素敏，在陳若曦筆下是很典型台灣家

庭婦女，樸實無華、溫良賢淑，對政治沒有興趣也不懂政治，「原想本本分分地做個賢妻良母」，出於對丈夫的敬愛，卻不幸捲進了政治的漩渦。⁴⁹ 其論述是將女性擔任「賢妻良母」視為政治民主下應有的生活，但現狀卻因政治不民主而失去在私領域擔任「賢妻良母」的安穩生活。政治民主下的女性是「賢妻良母」；政治不民主下的女性則「代夫出征」。「賢妻良母」與「代夫出征」的女性形象成為政治民主與否判準，也可以看出黨外民主論述中民主僅意涵政治民主，而未包含性別民主與女性參政意義在其中。在政治受難後，論述將方素敏呈現為一個「嬌小纖弱，卻又寬宏大量，極識大體的婦女、忍辱負重」的女性，⁵⁰ 其嬌小的女性身影與傳統女性的美德也幾乎是台灣民主苦難的象徵與承擔。許多男作家如林雙不、陳芳明也以男性作家的身分模擬方素敏的口吻，為民主苦難寫下文學作品。如以陳嘉農為筆名的陳芳明在美國時寫下〈迎方素敏〉一詩：

這次迎接你／是望你早歸的歌聲／那是台灣最長的期待／
你衷心低唱

-
41. 吳自然，〈許榮淑參加世界婦女政治領袖會議〉，《九十年代》創刊號（1987.03），頁52-55。
42. 陳孟元，〈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後期黨外運動的發展——凝聚、頓挫與再出發〉，《立人學報》2期（2002），頁93。
43. 張俊宏，〈張俊宏給許榮淑的一封信——分擔苦痛、維護公道〉，《台灣潮流》1期（1984.08），頁52-53。
44. 同註10，頁166-167。
45. 陳奇，〈周清玉徘徊選立委與來年大選之間〉，《這一代》30期（1983.03），頁5。
46. 鄧維賢，〈周清玉旋風〉，《政治家》1卷（1981.01），頁15。
47. 陳若曦，〈再出發的黨外〉，《深耕雜誌》9期（1982.05），頁32-33。
48. 同註40，頁30。
49. 陳若曦，〈我見到林義雄的太太〉，方素敏，《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台北市：三捷印刷廠，1983.11），頁17。
50. 同註49，頁18。

望君的心情／是連綿不斷的長空／一片雲，攜帶無語的思念
／總是停留在鐵窗外徘徊
望子的胸懷／是激盪不止的海洋／一股浪，蘊藏多少悲愴
／你的愛與慟是漲滿的潮水
望鄉的眼睛／是深夜不眠的視窗／一盞燈，燃燒熊熊的希望
／你從不輕易撚熄
這次迎接你／是望你早歸的歌聲／假使那是台灣最苦的期待
／我們與你齊聲低唱⁵¹

陳芳明模擬方素敏的口吻寫出一個等待、望夫早歸的政治受難女性。女性在過往文化中被視為是等候在家／私領域的守候者，等待丈夫歸來；相對的，當台灣民主受難時，女性以等待之姿期待政治參與主體的丈夫歸來。黨外論述中女性是為離家的男性而等待，也為政治民主而等待。陳芳明在這首詩所呈現的是女性歸屬於私領域，也歸屬於傳統性別中的等待者、守候者身分。另外，作家林雙不以「方素敏」為名寫下〈盼望〉一詩，之後收錄於《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中，一直被誤認為方素敏所寫，可是實際為林雙不以「方素敏」之名所寫，男作家之筆模擬黨外女性主體的作品。

〈盼望〉

人家說你是好漢
我就哭了
我寧願你

只是孩子的父親
 ……（中略）
 一直這樣盼望
 在家鄉長住
 你下田
 我燒飯洗衣
 確信你會在
 一定的時刻回來⁵²

林雙不在1980年2月28日林宅血案後，以悲痛的心情更改筆名為「林雙不」，並以「方素敏」之名，寫下〈盼望〉一詩，其「盼望」的身影便是「望你早歸」的政治女性身影。林雙不在《安安靜靜想到他》一書中自陳是為了詩的效果，才借用方素敏的姓名，實際上是寫自己的心情。⁵³ 然而詩的效果其實也產生論述的效果，文中寫著方素

51. 陳嘉農，〈迎方素敏〉，《台灣文藝》90期（1984.09），頁24-25。

52. 林雙不，〈盼望〉，《台灣新樂府》（台北：草根出版，1995.02），頁32-34。
 （完稿於1981年2月）本詩以「方素敏」為名，收錄於《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一書，頁37。亦刊登於《八十年代》（1981.02）。

53. 林雙不談到「一九八一年二月，我寫下〈盼望〉一詩。全詩共分九段四十行，以上四行就是這首詩的開頭和結尾，往後幾次選舉中，一再被女性候選人拿來做文宣的素材。這首詩是用女性的口吻寫的，為了加強詩的張力，發表時借用了林律師夫人的姓名。自然而然，詩句『我就哭了』的『我』，一般讀者朋友便以為是方素敏了。事實上不是，詩中是『我』是我自己，當年我三十一歲，大男人，感情不應這麼脆弱的人夫人父；而且林家的不幸已經是一年前的舊事了！但是沒辦法，只要念頭觸及這個慘案，我就忍不住心如刀割，淚水直流，不管人前人後，不論夜晩白天。」而方素敏問林雙不為何寫得如此真切，林雙不回答道：「林太太忘了，在我們身上，有一樣共同的東西。不論識與不識，熟或不熟，一旦苦難來臨，這樣共同的东西立刻就會把我們緊緊拉在一起。這樣東西是，我們身上都留著台灣人的血液。」見林雙不，〈每次一想到他〉，《安安靜靜想到他》（台北：草根出版社，1996.07），頁98。（1983年2月28日，真林完稿）。

敏期待自己可以「燒飯洗衣」，丈夫則「下田」工作，單純地僅擔任「孩子的父親」。在威權體制下，參與反對運動的男性被剝奪私領域的生活，因為政治高壓而入獄；女性則因為政治不民主而從日常丈夫守候者成為更漫長的民主守候者，甚至為政治不民主必須從私領域步上公領域。在林雙不筆下的女性，可以擔任傳統性別分工角色才是政治民主下的理想生活。上述兩位男作家筆下的方素敏，是一個等待丈夫歸來、為丈夫洗衣煮飯，「嬌弱的身體承擔這麼重的負荷」承擔台灣苦難的女性。方素敏則是這個苦難命運的象徵，因為「方素敏的苦難，是全體台灣人民的苦難。」⁵⁴ 方素敏的「嬌弱身體」、「望你早歸」的悲慟，其女性化的身影成為台灣苦難的象徵與隱喻。

上述論述中，「代夫出征」女性如許榮淑、周清玉、方素敏等人，被再現為原本希望本本分分地做個「賢妻良母」，「賢妻良母」的身分才是民主生活的方式，認為女性處於私領域中，才是民主幸福的圖像。其民主論述上，陷入一種矛盾的狀態，一方面鼓吹「自由」與「民主」，另一方面卻鼓吹傳統的家庭意識型態。從中可以看到黨外民主論述中，「民主」的意涵是政治民主，未包含女性走入公領域與政治參與的性別觀點，在性別意義上女性被置放在私領域才是政治民主的展現。在女性身影的呈現上，威權政治使得「平凡的弱女子」、「喉嚨馬上哽咽」的女性必須擔起「時代苦難」。在台灣追求民主化與政治現代性的過程中，國民黨的威權帶給台灣民主創傷與苦難，「悲苦的」、「柔弱的」、「平凡的」、「望你早歸」的「代夫出征」女性是政治不民主的受害者。在民主社會下，女性應該是幸福平凡的家庭主婦與「家中天使」，原本期待的是當一名洗衣煮飯平凡

的女性，但因為血與淚的民主創傷而「忍辱負重」地走上政治道路。因為政治的苦難，女性必須「代夫出征」，成為望夫早歸的受難者。其論述觀點為在非威權的社會下，可以在私領域擔任家庭主婦是一種民主社會的幸福，但黨外女性卻因為民主創傷與非常態的生活而扛起重擔，這些論述都形塑黨外女性的嬌弱形象，女性原本應該在私領域中，步入政壇的無奈是因為黨外民主的受挫。女性歸屬於私領域等同於政治民主的展現；女性步入政治則是政治不民主的創傷。上述論述都可見民主再現論述有傳統的性別意義在其中。此外，當強調「嬌弱」、「等待」、「悲傷」、「無助」、「陰柔」等強加在女性身上的性別特質時，一方面要強調女性生命的悲情；另一方面則是民主苦難的展現，其陰柔特質展現的是民主的創傷。

（2）走一條未走完的路：民主創傷後的「接班者」

「代夫出征」女性在丈夫入獄後，以「政治受難家屬」的身分參與選舉。參政女性被視為是民主的「接班者」，繼續走「一條未走完的路」。這些論述將女性放置在「接班者」位置，是接替丈夫的政治之路，繼續走一條丈夫未走完的民主之路。「接班者」論述一方面是指民主之路受創傷後必須再延續；另一方面也是將男性視為民主之路的主體，女性是民主之路的「接班者」與「接替者」。

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後，周清玉、許榮淑以「受難者家屬」身分「代夫出征」，以最高票當選增額國代和立委，「代夫出征」的黨外女性論述大量呈現，並延續到日後關於翁金珠、葉菊蘭等人的再現

54. 方素敏，《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頁62。

論述中。⁵⁵「代夫出征」論述都以「延續黨外香火」的民主人士身分被論述。因此，「代夫出征」的黨外女性一開始幾乎是以「民主接班人」的身分被再現。美麗島事件後的黨外雜誌裡「代夫出征」反覆出現，針對這些美麗島事件受難家屬的歷史定位上，將她們視為民主的接班者。

美麗島事件後，周清玉競選的〈薪火相傳〉的傳單上印著「民主的香火並沒有中斷」，⁵⁶ 強調儘管民主受重創，但是「受難者家屬」接替而起，民主的香火並不會因此中斷。另外，周清玉在〈走那沒有走完的路〉選舉傳單上寫著，「繼續走那嘉文沒有走完的路，希望下一代能有機會享受自由民主的果實。」⁵⁷ 「代夫出征」女性的傳單上，皆以民主受挫後的民主接班人自居，接續民主路上「未走完的那一條路」，周清玉是接續姚嘉文未走完的政治之路，繼續黨外運動的民主犧牲。參政女性是參政男性的「接班人」，參政男性作為參政主體，參政女性則是政治副手，以接班者身分接替了反對運動男性未走完的民主之路。許榮淑、周清玉，均以「延續黨外香火、追隨前輩腳步」作為政見主題。⁵⁸ 上述論述，將「代夫出征」視為填補民主空位、延續黨外香火、追隨前輩腳步的政治行動，其論述僅著重在民主創傷後，政治受難、民主延續的歷史觀點，而「民主」指涉是國民黨威權下政治受挫的黨外力量。

姜靜惠在〈方素敏的抉擇〉一文中，描述「溫婉嫺靜」的方素敏，在美國兩年多的隱居生活後，更真實、更冷靜，決定回台參選時，是「要用她小小的力量，來幫助台灣的民主前途。」⁵⁹ 以「小小的力量」去描述方素敏的女性／受難以及對抗國民黨威權的位置。另外，張俊宏在美麗島大審當天，寫下一份告白給許榮淑，文中大意

是「不要讓和平成為絕響」，⁶⁰ 許榮淑則說「俊宏這個告白，一千個日子以來，一直迴繞在我的心中。這些話使我抱著『和平改革者』的精神，來繼續完成俊宏的心願。」「毫無怨言的為整個台灣的民主運動來努力」。⁶¹ 許榮淑接下張俊宏在美麗島大審時的心願，走上政治，不讓和平成為絕響，意味著成為民主路上的接棒者。女性參政與當選，是一場威權的反抗與民主的審判，女性參政的意義被置放於「政治民主」的論述之下。「代夫出征」是民主創傷之後，民主之路的「接班者」接替入獄的丈夫從政，從政之後，悲苦的「望你早歸」與民主「接班者」在選舉後造成一股旋風，一躍成為「民主旋風」與「鐵娘子」。

2、從「太太」到「鐵娘子」與「旋風」現象：黨外力量的重振

(1) 從「太太」到女性主體：民主主體的壓抑到浮現

「代夫出征」女性一開始經常是以「某人的太太」的身分被認識。如周清玉是「姚嘉文的妻子」；許榮淑是「張俊宏的太太」；方素敏是「林義雄的太太」。「太太」身分是女性在婚姻體制中，因性別身分而扮演關係性、無名的、附屬的角色。政治受難女性一開始則

55. 方素敏一開始出現在公共言論中，便是以受害者「林太太」的身分出現在政治場域。方素敏編著，《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周清玉在姚嘉文入獄之後，出來競選國大，選舉海報上以「姚嘉文的妻子」作為標榜，並在政見會上播放〈望你早歸〉這首歌周清玉競選海報檔案，收錄於〈周清玉女士訪談錄〉，張炎憲主編，《民主崛起1980's 台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1》，頁227。翁金珠也被以「代夫出征參加省議員選舉」來形容，見顏幸如，〈始終未被命運擊垮的彰化媽祖〉，《溫柔的革命：女性政壇明日之星》（台北市：月旦，1998.04），頁67。

56. 同註10，頁168-169。

57. 同註10，頁166-167。

58. 同註42，頁93。

59. 姜靜惠，〈方素敏的抉擇〉，《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頁73。

60. 鄭南榕，〈不要使和平改革成為絕響〉，《深耕雜誌》23期（1982.12），頁23。

61. 同註60。

是因為參與黨外運動男性的身分被悉知。

呂秀蓮在其新女性主義論述中提到，「女子結婚後，一方面被戴上夫姓的帽子，另一方面又穿著『太太』的鞋子，一上一下的結果，『×太太』竟取代她原有的姓甚名誰了，她彷彿是看得到鞋帽卻見不著身子的隱形人。男子卻不然，打從出生時起，他是某某人便是某某人，而且從東到西，自始自終，永遠被喚『先生』，連名帶姓，一字不改。」⁶²「某人的太太」是以「民主人士背後的女人」被認識，可以看到女性在性別角色上是關係性的角色，在民主場域中也被視為附屬的角色。然而在民主論述場域中，受難者的「太太」角色，不僅僅作為性別上的關係性角色，亦成為民主路上一個苦難而悲情的象徵，而當從「×太太」的關係性角色到女性成為主體時，更有民主力量的再興的隱喻。

在1980年底中央民代的選舉當中，台灣的民眾第一次知道有許榮淑這麼一位女性，因為長期以來，許榮淑被以「張太太」身分熟知。從「張太太」到「許榮淑」的論述轉變有其政治意義：

從「張太太」到「許榮淑」是一條血淚交織、堅苦卓絕的旅程。在這一段時空內，也是台灣民主運動的轉折期——從地域性、草莽性到全省性而且邁向更現代的民主運動。長期以來，在重重壓力——來自政治、社會、經濟的，張家跟著台灣的民主運動逐步成長，而「張太太」也逐漸成長為「許榮淑」。

在六十四年「台灣政論」創刊前，張俊宏已為「大學雜誌」的編輯工作付出他大部分的精力，這時，從家庭的生

計——到朋友們的招呼便由張太太一手擔起來。那時她在南門國中執教，除了教學，為了負擔生計，她還得利用任何空檔做任何可能做的生意。家庭的生計並不是一個太大的難題，最大的擔子還是她先生以及朋友們從事政治活動上的經費——從辦雜誌、出書，到選舉和各種各類的政治活動，都是非錢莫辦。張俊宏是一個木訥型的人，朋友的招呼 and 團結工作便落到張太太身上，在運動過程中，這是一項最艱苦的工作，但長期以來，張太太不但勝任而且頗具成果。許多朋友都說張俊宏的成就一半是許榮淑的功勞。

在長期的磨練下，張太太基本上已具備一位政治人物的條件。六十七年，她曾出馬登記選監委，而六十九年的中央民代選舉雖然她的出馬多少有「代夫出征」的意義，但也是「張太太」到「許榮淑」必然的結果。

從「張太太」到「許榮淑」，是賢妻兼同志的最佳典
型。⁶³

上述論述中將「張太太」到「許榮淑」的成長過程，隱喻為台灣政治從不民主到民主現代化的過程。「張太太」是性別關係上的附屬位置；「許榮淑」則是政治前台的參政主體，一方面說明女性從關係性角色走上前台，是性別角色現代化的過程；另一方面指涉的是政治民主從壓抑到現代化的過程。許榮淑從只是成功男人背後的一雙推手到政治主體，強調脫離幕後籌錢招呼的賢妻「張太太」，逐漸走出

62. 呂秀蓮，〈新女性主義的內涵〉，《新女性主義》（高雄市：敦理出版社，1986.02），頁175。

63. 陳文茜、蘇逸凡，〈為黨外奉獻的六位女性〉，《政治家》24期（1982.03），頁22-23。

女性政治人物自我的特色，其實可以看到女性從關係性的角色活出自我，成為一個參政主體，所伴隨的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成長。民主運動的過程，賦予參政女性主體；女性主體的成長，是以民主主體的發展為基礎。

周清玉一開始參與選舉，是以「姚嘉文的妻子」身分參選。因此民眾知道她是「美麗島事件」主要被告姚嘉文的妻子。競選活動展開後，周清玉所有的傳單和擺在街上的廣告牌都註明她是「姚嘉文的妻子」。藉此，「大部分人立刻懂得周清玉參加競選的意義及本錢所在」。⁶⁴ 政治受難者妻子以接班者的角色參選，以延續姚嘉文尚未走完的民主道路，選票多寡彰顯的是對國民黨威權的反叛強度。1980年底中央民代選舉投票的結果，「周清玉以十五萬票高票當選，很快地她便從只有一小群黨外人士所認識的『姚太太』一躍而成為萬人矚目的政治人物。」⁶⁵ 從「姚太太」到「周清玉」是周清玉從妻子身分走向政治參與，從幕後到前台；從「姚太太」的「受難」到「周清玉」的「旋風」，可以看見敘述方式呈現從民主創傷、主體受壓抑到民主力量展現的過程。

方素敏在黨外論述中，是從傳統典範走入政治領域的女性。在當時的時代氛圍裡，方素敏原本是被定義為受呵護與寵愛的溫馴女性，如林雙不與陳若曦筆下，皆將方素敏形容為等待丈夫林義雄的歸來，想安安分分當賢妻良母的女性。⁶⁶ 在《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一書中，田秋堇等人在方素敏未參選時，一直以「林太太」稱呼方素敏，在家庭私領域的「林太太」身份是她被媒體與外界認識的方式。1980年228的林宅血案發生時，方素敏以「林太太」的身分，以及歷史的受害者角色被定義。如〈最長的一日——記林義雄先生的

家門慘變》一文中，描述「林太太強忍著悲傷」，⁶⁷ 在〈愛與死——給我的小朋友奂均〉一文中，「到景美軍法處辦交保之前，林太太拿輔佐人印章，她從病床上撐起身子，等待丈夫歸來的妻子。」⁶⁸ 在〈對過去的一個注目禮〉裡，「林太太迎著風，站在我前面，我仔細看了看她，發現她的頭髮好多都白了，白髮交纏著黑髮，在風中瑟瑟飄動。」⁶⁹ 當方素敏以「林太太」的身分被論述時，出現的是強忍著悲傷，在風中蕭瑟的女性。在方素敏決定出來參選時，她的個人身分逐漸替代關係性的身分被認知。當「林太太」轉變為「方素敏」，則是方素敏回國競選時，如《亞洲人》5卷6期的社論〈支持方素敏高票當選〉：「林宅血案發生於四年前的二月廿八日，方素敏回來的日子剛好是十月廿五日台灣光復節。如今方素敏決心獻身民主運動的行列，我們支持她選舉，不論為林義雄、為美麗島或為民主政治，我們都希望她高票當選，她非高票當選不可。」⁷⁰ 方素敏高票當選是一種民主力量的展現。

當方素敏走入政治參選時，出現的不再是強忍著悲傷、平凡家庭主婦的形象，而是冷靜、堅強、有決心、獻身民主的形象。在方蘭的〈支持方素敏，釋放林義雄〉一文也用「冷靜、堅強、普受支持」來形容方素敏。而方素敏回台參選立委更是為了自由與民主的「自主

64. 同註46，頁15-16。

65. 同註45，頁5。

66. 陳若曦，〈我見到林義雄的太太〉，頁18。

67. 林南窗，〈最長的一日——記林義雄先生家門慘變〉，方素敏編著，《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頁5。

68. 秋董，〈愛與死——給我的小朋友奂均〉，方素敏編著，《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頁9-11。

69. 田秋董，〈對過去的一個注目禮〉，方素敏編著，《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頁71。

70. 社論，〈支持方素敏高票當選〉，《亞洲人》5卷6期（1983），頁碼0。

決定」。文中提到「方素敏變得冷靜而堅強，與四年前的她，迥然不同，每一個人想到『痛苦使人成長、痛苦使人堅強』，都有感到一種欲哭的心痛，方素敏林家的犧牲畢竟太大了。」⁷¹ 方素敏從嬌弱的、溫馴的、苦難的、賢妻良母的「林太太」變為冷靜、堅強、自主性高的「方素敏」自己，其性別形象的轉變，表面是描述方素敏的轉變，實則隱喻民主從創傷走向重生。〈在義光教會〉一文中，許榮淑提到「林義雄的太太回來了。看到她堅忍、堅毅，滿懷信心」「我們看到她跟兩年前，有很大的不同。兩年前，她去美，很軟弱；現在她很堅強。」「我希望我們來學林太太的精神，她的精神就是代表台灣人的精神，就是沒有驚惶、有希望的台灣人。」⁷² 從軟弱到堅強，從受創到沒有驚惶，方素敏成為台灣人學習的典範，也成為「台灣苦難的象徵」到「台灣民主的象徵」，其隱喻所要指涉的也是民主力量的再生與重振。

在其論述中，方素敏的「苦難」到「大仁大勇」，背負的是台灣民主的發展與期待，從受傷的「太太」成為可以忍受痛苦、堅強的民主主體。上述論述中，當公／私、男／女、陽剛／陰柔具有上／下位階關係時，黨外論述出現私領域的「某太太」此性別附屬角色的論述方式時，一方面將女性放在位階低／私領域／陰柔的位置，指涉民主受創；但當政治受難女性從「某太太」變成連名帶姓的位階高／公領域／陽剛的某人時，論述意義也從政治受難成為民主力量的展現。此外，「代夫出征」女性的悲情經常隱喻台灣民主的苦難，其力量的展現又成為台灣人的典範。論述中「代夫出征」女性的成長與黨外運動的成長是相伴的，「代夫出征」女性的主體，是民主發展的結果，而非性別意義上女性主體的生成。

(2) 再出發的黨外：「鐵娘子」與「旋風」現象

在「代夫出征」的論述中，「代夫出征」女性從關係性的「某太太」成為「某人」的參政主體時，是民主力量的生成。當選舉大勝時，「代夫出征」論述轉向了「鐵娘子」論述與「旋風」現象，從「代夫出征」到「鐵娘子」與「旋風」現象，幾乎是一種民主重振的隱喻。在黨外論述中，許榮淑也不斷被以「鐵娘子」的形象被論述，方素敏與周清玉則被描述為「方素敏旋風」、「周清玉旋風」，其中都暗喻民主道路的轉型與重振。

在1980年底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周清玉從「一位鮮為人知的弱女子，挾著千軍萬馬之勢」，風靡了台北市，席捲了十五萬餘選票。「國民黨的傳聲機構在面子盡失之餘，竟說這完全是『同情票』、『眼淚票』」，「差一點哭倒了國民黨的長城。這就是所謂的『周清玉旋風』」。周清玉由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變成了一個「公眾人物」。⁷³ 旋風時期的周清玉，是從「望你早歸」的悲情與眼淚，到挾著「千軍萬馬」之勢，哭倒了國民黨的長城，是重新肯定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的女性。選舉大勝之後，黨外雜誌出現論點相當一致的「周清玉旋風」報導。⁷⁴ 早期周清玉被放置在位階較低的柔弱的、平凡的、私領域的家庭主婦位置；「旋風周清玉」則放置在位階高、陽剛性、千軍萬馬之勢，展現出公共／陽剛性以表達民主力量重振與

71. 方蘭，〈支持方素敏，釋放林義雄〉，原刊載於《前進廣場》13期，收錄於《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頁78-79。

72. 〈在義光教會〉，方素敏編著，《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頁81。

73. 申生，〈化悲痛為關懷——訪周清玉女士〉，《深耕雜誌》23期（1982.12），頁21。

74. 如陳文茜、蘇逸凡撰文提到：「六十九年底中央民代選舉投票的結果，周清玉以十五票高票當選，很快地她便從只有一小群黨外人士所認識的「姚太太」一躍而成為萬人矚目的政治人物。」同註63，頁23。

國民黨威權的動搖。鄧維賢〈周清玉旋風〉描述周清玉吸引了三、四萬人的人潮，「是『周清玉旋風』高潮的開端」。⁷⁵《政治家》創刊號也以「周清玉旋風」為題刊出周清玉的公開信。周清玉提到：「我的信念裡，民主政治不應有暴烈的疾風，也不應有英雄式的旋風；民主只是善良老百姓，所應享有的平靜的生活方式，民主是空氣、陽光和水，是上帝放手讓人類自行設計的另一份天然物」。文中寫著自己「秉持著『絕對奉獻，毫無怨言』的信念，忘掉個人微不足道的苦難與哀愁，作一名盡責的國大代表。」⁷⁶鄧維賢也描述周清玉打破「沉悶」，「奮不顧身地站出來」，「國代選情方面，周清玉一馬當先，勢不能擋。周清玉的文字宣傳攻勢極為成功，為她往後所向披靡的選戰鋪下坦途。她在演講場合的表現是「一位強者」；這跟她在「美麗島事件」審判後私底下的表現，形成尖銳的對照。……是「純真」、「勇敢」的化身。⁷⁷周清玉從受害者轉為勇敢的強者形象，甚至成為純真、勇敢的化身。

陳若曦〈再出發的黨外〉、狄灰心〈周清玉再考第一！〉等文則敘述黨外女性已擺脫了政治受迫害的形象，以政治活動家和政權的制衡者要求自己。淚如泉湧的周清玉前後判若兩人，顯得堅強而且穩健，早走出了家庭，大踏步走進社會，以社會工作者的胸懷去關懷時局和國家大事。⁷⁸「周清玉旋風」擺脫過去只會流淚的淒苦形象，政見訴求也由堅定、高亢而至於充滿歷史感。⁷⁹從政治受迫害的形象，成為堅強而穩健的政治人物。陳若曦一開始就說明「現階段的台灣黨外，以我的觀察，已經從美麗島事件的創傷中脫穎而出」，周清玉形象的轉變，也是「黨外歷史的再出發」。在1986年的國大選舉文宣中，以「台灣的柯拉蓉」、「新黨的催生者」⁸⁰描述周清玉，周清

玉、許榮淑從台灣人苦難的形象，成為奮不顧身、純真勇敢的強者、台灣人典範、黨外歷史再出發的形象。論述將女性的形象轉變影射為民主運動從重創到勝選的轉變。

另外，方素敏回國參選，黨外雜誌也出現「方素敏旋風」論述。方素敏被視為激起不下於周清玉當選時所激起的旋風。公孫龍說到方素敏決定參選時，造成一股「方素敏旋風」，⁸¹方素敏拒絕整天埋沒在悲痛流淚痛苦之中，且為了對自由生活的信念，所以堅決回台灣參選。對台灣形勢有了深一層的瞭解，「由於受到許多痛苦，政治對我打擊很大」，不希望台灣再有任何人發生1980年228的悲劇，「所以我決心站起來」。⁸²方素敏從「生活在象牙塔中」，「受盡眾人的呵護」，「個性內向與世無爭」，到走出象牙塔，⁸³站起來成為一股「方素敏旋風」，黨外女性的創傷修復，也是黨外民主力量的重振。

另外，許榮淑從「美麗島」受刑人家屬，成為兼代夫職且能在立法院針對政府行政弊端質詢，具有魄力與能力的政治人物。「劇力萬鈞，咄咄逼人的許榮淑」，在張俊宏判刑十二年時，出馬競選而當上中央級的立法委員。⁸⁴在代夫出征高票當選之後，許榮淑被以「女強人」、「鐵娘子」、「頑強的」、「大姊頭」的形象出現，黨外圈

75. 同註46，頁15。

76. 周清玉，〈周清玉的第一封公開信——向臺北市民及熱愛民主的同胞致敬〉，《進步雜誌》1卷1期（1981.04），頁83。

77. 同註36，頁16。

78. 同註47，頁32-33。

79. 狄灰心，〈周清玉再考第一！〉，《薪火》74期（1986.12），頁25-27。

80. 當時周清玉文宣的設計為復興美工畢業的小邱。

81. 公孫龍，〈周清玉的痛苦——對政治沒有興趣竟成為「黨外樣版」〉，《雷聲》32期（1984.11），頁30。

82. 方素敏，〈方素敏回國記者會〉，《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頁74-75。

83. 方素敏，〈這一年來〉，《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頁21。

84. 編輯部，〈許榮淑對上林洋港〉，《新生代》創刊號（1982.04），頁39-40。

內也以「女中孟嘗」稱呼許榮淑。⁸⁵「台中市政的女強人」⁸⁶負責、熱忱、不妥協而博得「黨外鐵娘子」稱號，「與國民黨高官常因糖尿病、高血壓等富人病住院相比」，黨外政治人物才是真正在為民服務。⁸⁷「鐵娘子」在論述生產的脈絡中，是強壯、堅強、具有攻擊性格的政治女性。女性的傳統性別位置被置放在陰柔、無攻擊性格的性別特質當中，「鐵娘子」的形容一方面指許榮淑未符合傳統性別框架，一方面也指稱從政女性突破政治的邊界；在黨外雜誌將許榮淑與國民黨老法統相對照的敘述脈絡，「鐵娘子」更隱喻黨外力量的強悍。

「鐵娘子」論述呈現黨外力量的扎根與老法統的衰落。許榮淑的「黨外鐵娘子」形象，相對照的是「國民黨高官常因糖尿病、高血壓」的老法統，鋼鐵般的強悍與不妥協所要代表的是黨外的強悍與不妥協，並形成對抗國民黨的力量。〈鐵娘子大發雌威——許榮淑締造立委最高記錄〉描述許榮淑於1986年當選立委，原因為選戰策略應用得宜、辛勤耕耘基層、政治手腕靈活，儼然有「大姊頭」的風格。⁸⁸〈許榮淑不愧「鐵娘子」——全國最高票的立委當選人〉一文提到許榮淑是全國最高票的立委當選人，助選陣容比以往強，許榮淑選票激增，「美麗島家屬」起家，其立場從未被懷疑過，六年以來，各地反對陣營新銳不斷崛起，唯獨中部地區，從未見新人出頭，「許榮淑理所當然的就被視為中部地區最傑出的黨外代表人物。」經過六年的努力，「許榮淑已將反對勢力紮根在中部地區了，這項成績為都不能否認，『黨外鐵娘子』的美譽，絕非浪得虛名。」⁸⁹「鐵娘子」論述更象徵黨外力量強悍、鋼鐵、再生的化身，如陳若曦談到許榮淑時：

長期的孤軍奮戰，她所以能堅持下來，依賴的是對民主的信心和民眾對她的支持。

許榮淑經過化妝而容光煥發的臉，使我看到了黨外的化身。黨外長期處於民意不受重視，荊棘叢生的逆境中；現階段的黨外，更是大病初癒。然而黨外絕不自傷自憐，而是用理智和毅力包起了創傷，以希望的笑容迎接挑戰。黨外頑強的她必定取得勝利。⁹⁰

黨外在逆境中絕「不自傷自憐」，因此悲情的、苦難的、望君早歸的「代夫出征」論述勢必轉型，取而代之的是「鐵娘子許榮淑」、「周清玉旋風」、「方素敏旋風」的頑強形象。因對民主發展的信心而產生的堅強，許榮淑更成為「黨外的化身」，是一種黨外力量再興的象徵。「代夫出征」許榮淑到鐵娘子許榮淑，成為「黨外象徵的堡壘」。⁹¹ 黨外雜誌大量出現許榮淑台中服務處已成黨外象徵的堡壘，帶動了地方民主運動風潮的文章。此堡壘推動台灣民主政治的健全發

-
85. 三林，〈把民主帶到立法院——訪許榮淑委員〉，《深耕雜誌》2期（1981.07），頁7。
86. 《民主天地》週刊選舉小組，〈許榮淑聲勢壯，國民黨內力強〉，《民主天地》37期（1985.11），頁24-27。
87. 「黨外黨外」報導，〈鐵娘子許榮淑病倒入院〉，《台灣廣場》10期（1984.08），頁54。
88. 何路，〈鐵娘子大發雌威——許榮淑締造立委最高記錄〉，《領先》2期（1986.12），頁4。
89. 王霞，〈許榮淑不愧「鐵娘子」——全國最高票的立委當選人〉，《薪火》74期（1986.12），頁41-43。
90. 同註47，頁33。
91. 如黨外雜誌提到「地方人士將立委張俊雄服務處擴大，容納新當選的市議員，並改名為高雄市黨外聯合服務處，與許榮淑台中服務處一樣，乃成為黨外象徵的堡壘。」見〈高雄將舉辦林弘宣、陳菊出獄歡迎會〉，《深根週刊》1卷（1986.03），頁55。

展，貢獻卓著，「在許多民眾心中，它是精神堡壘，但在國民黨市黨部民情、特機關的眼中，則是令他們頭痛的民主聖地。」⁹² 鐵娘子許榮淑／精神堡壘／民主聖地的相互指涉，以「代夫出征」的悲情到「鐵娘子」的「旋風」力量進行政治民主創傷到復興的隱喻。「代夫出征」女性從悲情的「望你早歸」形象，走向「鐵娘子」的陽剛形象，站起來的勇敢身影，是純真、勇敢與黨外力量的化身，其中性別特質的隱喻指向民主力量的展現。

四、結論：黨外女性的再現與民主意義

本文以黨外雜誌為觀察對象，認為黨外雜誌作為民主論述的場域，主導論述是「自由民主論述」，其「民主」意涵指涉的是政治民主的現代化。在國民黨威權體制下，政治民主／性別民主具有上／下位階，國家威權下，父權文化議題被忽視。黨外雜誌以「反國民黨威權」為目標，將女性放置在家／國之下的論述居多。這些都影響黨外女性被放置在民主位置的論述方式。未受國民黨迫害的黨外女性原本應安穩地在私領域中，但因為民主的創傷，所以成為「望你早歸」的女性，其陰柔特質展現民主的無辜與受創，之後因為女性主體產生，成為陽剛強悍的鐵娘子形象，象徵黨外力量的再生。而「四大女寇」的強悍特質，是反國民黨力量的象徵。本文發現陽剛／陰柔；上／下；民主重振／民主受挫；某太太／連名帶姓的某人都具有上／下位階，且是相互指涉、相互隱喻的。

黨外論述中黨外女性的主體其實隱喻民主力量的再生。黨外女性在黨外雜誌中的論述，可以看見她們被放置在民主論述中，民主身

分大於性別身分，「女性描述」其實是一種「民主闡述」。黨外女性在黨外雜誌出現幾種論述模式，其中包括具備奉獻犧牲精神、強悍俠義、戰士出征形象的「四大女寇」；望你早歸、民主苦難象徵的「代夫出征」女性、形單影隻的「受刑人太太」、強硬的「鐵娘子」形象、重新站起來的「某太太」與「旋風現象」，在這些論述當中，可以看見凡是出現陽剛特質的隱喻，都指向民主力量的出現與復興；而當出現柔性、淚水與悲情等待，都是指向台灣民主運動的受挫。黨外女性被放置在民主論述的位置，或者可以進一步說，黨外女性論述所隱喻的是民主歷程的發展。黨外女性出現「戰士型」與「受難型」；陽剛與陰柔特質的兩種對照，這兩種對照所進行的是一種民主反叛、受挫與再生的表述。黨外民主論述中，黨外女性被再現為兩種類型，一種為獨身、陽剛；另一種為家屬、受難、陰柔，其中女性受害者代表台灣的苦難；當呈現女性力量時，所要凸顯的則是民主力量的重振。

參考資料

一、中文

(一) 專書

方素敏編著，《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台北市：三捷印刷廠，1983.11）。

呂秀蓮，《新女性主義》（高雄市：敦理出版社，1986.02）。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10）。

———，《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8.05），二版。

林雙不，《台灣新樂府》（台北：草根出版，1995.02）初版。

92. 不詳，〈許榮淑台中服務處已成黨外象徵的堡壘〉，《深根週刊》1卷（1986.03），頁40。

——，〈安安靜靜想到他〉（台北：草根出版社，1996.07）。

張炎憲主編，《民主崛起：1980's台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1、2》（台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8.04）。

陳品，《非常女人》（台北市：大村文化，1996）。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策劃，《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台北：時報文化，1999）。

楊青矗，《美麗島進行曲：第一部 衝破戒嚴》（台北：敦理出版社，2009.07）。

鄧小南、王政、游鑑明主編，《中國婦女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04）。

薛化元主編，李永熾監修，台灣史料編輯小組編輯，《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1979-1988）》（台北市：國家政策出版，1991.07）。

余志明主編，《溫柔的革命：女性政壇明日之星》（台北市：月旦，1998.04）。

（二）論文

林清芬，〈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台灣黨外政論雜誌查禁之探究〉，《國史館學術集刊》5期，（2005.03）。

陳孟元，〈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後期黨外運動的發展——凝聚、頓挫與再出發〉，《立人學報》2期（2002），頁93。

陳翠蓮，〈黨外書籍與台灣民主運動（1973-1991）〉，《台灣文獻》55卷1期（2004.03），頁3。

（三）報紙

何榮幸，〈曾與呂秀蓮、陳菊、施淑青並稱「黨外四大女寇」 抗癌11載 蘇慶黎病逝北京〉，《中國時報》，2004.10.20，a13版。

（四）期刊

〈高雄將舉辦林弘宣、陳菊出獄歡迎會〉，《深根週刊》1卷（1986.03.03），頁55。

〈蘇慶黎：為弱者說話的女強人〉，《新生代》創刊號（1982.04），頁16-19。

《民主天地》週刊選舉小組，〈許榮淑聲勢壯，國民黨內力強〉，《民主天地》37期（1985.11），頁24-27。

《生根》週刊特別報導，〈呂秀蓮回來了！〉，《生根》復刊3期（1985.04），頁31。

「黨外黨外」報導，〈鐵娘子許榮淑病倒入院〉，《台灣廣場》10期（1984.08），頁54。

- 三林，〈把民主帶到立法院——訪許榮淑委員〉，《深耕雜誌》2期（1981.07），頁7。
- 不詳，〈許榮淑台中服務處已成黨外象徵的堡壘〉，《深根週刊》1卷（1986.03），頁40。
- 公孫龍，〈周清玉的痛苦——對政治沒有興趣竟成為「黨外樣版」〉，《雷聲》32期（1984.11），頁30。
- 孔傑榮，〈呂秀蓮的心路歷程〉，《鐘鼓鑼》1卷7期（1983.07），頁29。
- 方蘭，〈支持方素敏，釋放林義雄〉原刊載於《前進廣場》13期，收錄於《對臺灣的愛：方素敏的抉擇》，頁78-79。
- 王霞，〈許榮淑不愧「鐵娘子」——全國最高票的立委當選人〉，《薪火》74期（1986.12），頁41-43。
- 申生，〈化悲痛為關懷——訪周清玉女士〉，《深耕雜誌》23期（1982.12），頁21。
- 何路，〈鐵娘子大發雌威——許榮淑締造立委最高記錄〉，《領先》2期（1986.12），頁24-25。
- 吳自然，〈許榮淑參加世界婦女政治領袖會議〉，《九十年代》創刊號（1987.03），頁52-55。
- 李蓮英，〈蘇慶黎赴美深造〉，《政治家》1卷（1984.07），頁39。
- 狄灰心，〈周清玉再考第一！〉，《薪火》74期（1986.12），頁25-27。
- 周清玉，〈周清玉的第一封公開信——向臺北市民及熱愛民主的同胞致敬〉，《進步雜誌》1卷1期（1981.04），頁83。
- 林龍溪，〈黨外的「苦力」，新生代的「褸母」——為理想無私奉獻的陳菊〉，《第一線》19期（1986.05），頁36。
- 社論，〈支持方素敏高票當選〉，《亞洲人》5卷6期（1983）。
- 邱小如整理，〈陳菊，我們感念你！〉，《台灣年代》8期（1985.06），頁45-46。
- 軒輶平，〈折筆傳奇——陳婉真的心路歷程（上）〉，《美麗島》1卷2期（1979.09），頁42-45。
- 張俊宏，〈張俊宏給許榮淑的一封信——分擔苦痛、維護公道〉，《台灣潮流》1期（1984.08），頁52-53。
- 深耕雜誌社，〈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座談會〉，《深耕》18期（1982.09），頁5。

- 陳文茜、蘇逸凡，〈為黨外奉獻的六位女性〉，《政治家》24期（1982.03），頁23。
- 陳奇，〈周清玉徘徊選立委與來年大選之間〉，《這一代》30期（1983.03），頁5。
- 陳若曦，〈再出發的黨外〉，《深耕雜誌》9期（1982.05），頁32-33。
- 陳嘉農，〈迎方素敏〉，《台灣文藝》90期（1984.09），頁24-25。
- 葉鴻英，〈忍著辛酸含著微笑——訪尚在服刑的美麗島事件受難者家屬〉，《前進》22期（1984.08），頁30。
- 編輯部，〈許榮淑對上林洋港〉，《新生代》創刊號（1982.04），頁39-40。
- 鄧維賢，〈周清玉旋風〉，《政治家》1卷（1981.01），頁15-16。
- 鄭南裕，〈不要使和平改革成為絕響〉，《深耕雜誌》23期（1982.12），頁23。

二、西文

Connell, R. W.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5.)

Nira Yuval-Davis, *Gender & N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1997.)